

編後語

近兩年，本刊在首欄「二十一世紀評論」推出若干組討論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文化現象的文章，它們多由海外中國學人撰寫，並引起熱烈回應。另一方面，這也引起某些生活在國內的學人強烈不滿。意見衝突的焦點集中於：如何理解與研究當代中國？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正就是針對這一問題的激烈論辯。劉東、雷頤兩位用「洋涇浜學風」這一詞語尖銳地批評多位海外學人文章的立論和方法（這些文章主要在本刊刊出）；而崔之元和甘陽兩位則以有沒有「認識論上的特權」、「誰是中國研究中的「我們」？」加以反駁。兩方的意見可謂針尖對麥芒，十分犀利。我們之所以要將針鋒相對的雙方在同期同欄刊出，一方面是基於把《二十一世紀》辦成「咖啡館」的開放立場，另一方面也由於四位作者都是本刊最熱心的朋友、支持者和編委，《二十一世紀》理應成為他們對立觀點交鋒、碰撞乃至溝通、融和的場所。我們熱切希望，這場討論可以在如何運用西方理論與如何真正了解中國現實這兩方面，都能有所闡發和建樹。

雖然歷史不像當代問題那樣敏感，上述問題也同樣存在於歷史研究之中。在本期「百年中國」一欄，我們刊載了今年6月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中國近代歷史的社會學闡釋」研討會上的三篇論文。從這些文章可以看到，用甚麼理論去理解和研究中國近代史，同樣備受注目和富有爭議性。本期佳作甚多，例如何培斌的文章選取了很特別的角度——清代繪畫，從畫家的眼中看建築，展現出在中國古典建築、繪畫和文學三者之中一脈相承的文化精神；著名政治學家夏皮羅(Ian Shapiro)談了他對民主與市民社會有關理論問題的新見解；「經濟與社會」中孫隆基、翟學偉兩文則用大量生動事例和比較來討論中國人的人格模式。

我們還特別向讀者推薦徐國琦、徐賁的兩篇文章。眾所周知，越南戰爭是二戰後影響世界大局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徐國琦生動地介紹了美國人對越戰現代記憶的最新動向及其影響，然後他指出，美國一貫的自我中心和霸權心態不僅使其難以對越戰作出深刻反省，也使其外交政策一再失誤。徐賁在評介《現代中國的民眾抗議和政治文化》一書時，特別重提美國的政治文化研究的歷史和現狀；而政治文化的研究恰恰是我們討論當代中國文化中的薄弱環節。